

# 社会记忆、认同重塑与生存策略\*

——一项对资源枯竭型城市下岗工人的质性研究

刘诗谣 陈光金

**提 要：**在资源枯竭型城市中，国企改革过程中分流、买断、破产等政策的实施使得下岗工人的身份认同发生巨大转变。身份认同是建立在社会记忆基础上的，社会记忆中的事件、经验、情感构成了其身份认同重塑的基础。而身份认同不只是认知建构，它作为行动者获取行动意义的源泉，直接影响到其进一步的行动策略。本文基于对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L矿的质性研究发现，下岗工人在“对辉煌时期单位人的留恋”和“对衰退期单位人的不满”两种社会记忆基础上建构了“工人老大哥”“社会底层”“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下岗工人在这三种身份认同下，又分别形成了自力糊口型、外部依赖型和进取发展型三种不同生存策略。

**关键词：**社会记忆 认同重塑 生存策略 下岗工人

## 一、引 言

1999年L矿破产了，就在我的亲人们中，提前退休的退休、买断的买断，成了一群没娘的孩子。原来整洁、规矩、安静的矿大院，变成了各种买卖的营业场所，乱七八糟。原来抚顺的地标——“大架子”，千疮百孔，破破烂烂，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向谁诉说心中的迷惑和不解。一些买断工龄的工人，不得不开着小三轮，在脖子上挂着“力工”的牌子在街头等着雇主的到来。L矿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根’，L矿破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ZDA079；主持人：陈光金）。

产，我们都成了‘没娘的孩子’。L矿破产，对于我们这些依L矿而生存的人来讲，就像是在心里捅了一刀，忽然间魂儿就没有了。（个案编号：RSC30）

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在不同的时空和单位组织、生产生活领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于煤矿工人来说，煤矿破产前，他们是“国家工人”，是由国家或单位为其提供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这种身份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阶层或者说社会等级，它代表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及其工人所享受的一种制度性特权（谢茂拾，2005：42-43）。而煤矿的破产，将原来共享统一身份的工人群体推向社会。国家力量逐渐退出，市场力量全面进入，资本、市场和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得原来共享统一身份的工人群体发生分化。煤矿辉煌时期作为工人身份认同的物质、福利基础被逐渐剥蚀，他们不再拥有既往被制度建构的企业“主人”的身份，过去的“主人翁”身份已经解体，一夜之间，他们从“吃公家饭”的“工人老大哥”沦落为“没娘的孩子”。

产业工人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也经历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痛苦和迷茫，在资源枯竭型城市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直到今天，他们大部分人仍然是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利益受损群体，有着较深的相对剥夺感。就他们与整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关系来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城市的顺利转型与和谐稳定发展。然而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载体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中工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相背离，并从归属、自尊、自我意义和价值体验等方面加剧了工人身份认同的危机，下岗工人在诸多身份的互动与冲突中重塑身份的认同。直面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将其身份认同作为研究主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辽宁省抚顺市煤矿L矿的下岗工人为例，从社会记忆角度切入，分析社会记忆对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及其内在的逻辑机制，并讨论了重构后的身份认同对工人的行动策略的影响。本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打开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提供另外一种解释模式，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笔者于2018年7月1日至8月30日深入辽宁省抚顺市L街道进行调研，采用半结构式的个案访谈，共访谈了13名下岗工人，与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40分钟至100分钟不等。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下岗工人对单位体制内生活和工作的叙述与记忆、他们对煤矿破产的态度、他们在下岗后所采取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当下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等。同时，为了丰富个案类型，本文引用了由北京“那些年口述

历史制作推广机构”对同一个煤矿所做的名为“抚顺 L 矿口述历史项目”的访谈资料。该项目是以 L 矿的工人为访谈对象，访谈主题包括生产、革新、辉煌、破产、下岗、生存、上访、现状等，本文引用了其中的 8 个个案资料，加之笔者自己访谈的 13 个个案，个案总数共计 21 个。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描述

编号	年龄	性别	教育程度	进入 L 矿时间	单位内原职务	买断情况	下岗后再就业情况
C1	62	女	初中	1978	雕合工	被动买断	待业
C2	61	男	小学	1976	司机	被动买断	打零工
C3	56	男	小学	1979	充填工	被动买断	打零工
C4	48	女	初中	1987	坑下采煤	主动买断	个体户
C5	51	男	初中	1989	坑下采煤	主动买断	出租司机
C6	53	男	初中	1989	坑下采煤	主动买断	私营企业
C7	55	男	小学	1984	配件工	被动买断	无业
C8	50	女	高中	1990	验收员	主动买断	个体户
C9	63	男	小学	1977	锅炉工	被动买断	力工
C10	56	男	初中	1984	办公室职员	被动买断	临时工
C11	45	女	初中	1991	捡煤工	被动买断	无业
C12	55	男	大专	不详	技术员	被动买断	私营企业
C13	59	男	初中	1981	铁道工	被动买断	力工
RSC5	66	男	高中	1971	矿长	——	——
RSC6	57	男	不详	不详	司机	被动买断	打零工
RSC7	54	男	不详	1980	看泵工	被动买断	打零工
RSC15	86	男	本科	1957	总工程师	破产前已退休	退休
RSC22	57	男	不详	不详	司机	被动买断	打零工
RSC24	50	男	大专	1990	党办室机要员	被动买断	私营煤矿
RSC29	69	女	不详	1975	皮带工人	提前退休	退休
RSC30	68	男	不详	1962	团支部书记	因工作调动离开	退休

注：编号为 RSC 开头的个案来源于“那些年口述历史机构”的访谈资料；编号为 C 开头的个案是笔者自己访谈的个案。

## 二、文献回顾

### (一) 身份认同的建构

在社会学的认同理论看来，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相同类别的人群就其相似性进行强化、不同类别的人群就其差异性进行强化的过程，这种强化的结果产生了类

型的分化（陶宇，2011）。个体将自己编入某一群体，并且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比较对照，同时也会将自身当前状况与过去状况进行比较，进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了清晰的体会，在此基础上加以承认甚至接受。也有学者将身份认同视作行动建构，认为文化身份/认同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在本质主义的信仰下进行的不自觉的建构行动（张岳、良警宇，2011）。张淑华等人（2012）指出，身份认同意味着主体对其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的确认，对身份或角色的共识及这种共识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身份认同具有层次性。一是对身份认同的认知，这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基础，它包含两个部分，主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归属群体的认知。二是主体对自我归属于某一角色身份或群体的情感，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三是主体在这些认知和情感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行为模式。在他们看来，身份认同是认知和行动的共同建构。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作为认知建构的身份认同，还是作为行动建构的身份认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个体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周嘉倪，2017）。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一个依据情景的变化而动态建构的过程。个体怎样识别自己，并怎样被他人识别，会因情景不同而发生变化。

## （二）社会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建构

在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社会记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记忆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和（孙德忠，2006：12）。社会记忆对个体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起着决定性作用（朱兴涛，2014）。有研究指出，社会记忆不仅为个体界定和认同自己提供了一种非常必要的意义背景或情境，同时也为后继一代提供了认同的基础（艾娟、汪新建，2011）。社会记忆所提供的事实、情感构成了身份认同的基础。作为一种有选择的记忆，社会记忆会在建构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某些记忆内容，遗忘和淘汰另外一些内容，由此建构的“选择性记忆主题”会引发身份认同的变化（艾娟，2010）。并且在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社会记忆实践活动也参与其中，成为维护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不断强化社会记忆的主题，重复激活群体成员的共享情感，社会记忆由此成为身份认同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有效路径（艾娟，2010）。社会记忆引导个体记忆，但前者不同于后者并有其特定的发展路径。社会记忆是整体性、长期性的，它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它基于无数不同个体的回忆之上，并界定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叶子，2014）。而个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随机化的，它

具有短暂性、易变性。绝对脱离社会记忆的个体记忆是没有意义的，个体记忆只有与更广泛的社会记忆网络相连接，才能够不断在社会上得到解读（万恩德，2018）。

个体在社会记忆基础上形成的身份认同不仅会给个体带来情感和价值意义，并且属于某群体的意识会强烈影响着个体的知觉、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个体行动的指南（王莹，2008），是个体行动的积极创造者（李峰，2010），行动策略则是个体基于主观认同所做出的行动模式选择。有学者将这一影响逻辑归纳为“边界—认同—行动选择（策略实践）”（宣朝庆、司文晶，2015）。

### 三、作为身份认同重塑基础的社会记忆

国企改革给下岗工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轨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他们经历了一次断裂、破碎和转换。个体所经历的任何转换都必然涉及身份的重构，而身份的重构与社会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社会记忆的视角研究认同重塑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为何认定我们是谁”“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谁”的问题。下岗工人经历由“国家的主人翁”到社会底层“失业半失业者”的身份转变之后，新的环境必然与他们记忆中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认知发生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生活经历之下，文化教育、家庭环境、工作单位等各个场所形成的社会记忆，必然会不断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身份认同。因此，在下岗工人身份认同转变与重塑的过程中，单位体制内的社会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社会记忆是人们生活和行动的一个重要维度，个体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记忆得以解构、重塑和变化。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记忆”是无法直接认知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于“叙述”了解和解读记忆（王汉生、刘亚秋，2006）。个体在叙述过去的人生经历过程中建构和发展着自我的身份认同。社会记忆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所经历的不同生命历程和生活行动，会给他们留下不同的社会记忆。从下岗工人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尽管他们都曾有单位体制内“铁饭碗”的经历，但是其留存的记忆却各不相同。一部分下岗工人保留的是单位体制下“工人老大哥”的辉煌记忆，另一部分人对单位体制的社会记忆则是“大锅饭”以及单位制对个人发展机会的限制。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记忆对下岗职工的身份认同重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他们身份认同重塑的基础。

### （一）对辉煌时期“单位人”的留恋

持有辉煌时期“单位人”社会记忆的工人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以全民职工的身份进厂，那是L矿的辉煌时期。这部分工人在回忆单位体制内的经历时，“那时候单位多吃香啊”“福利待遇好”“工人的社会地位高”“领导并不比工人多开多少钱”等是其叙述的主要内容。正如受访者所强调的那样，辉煌时期L矿的工人，尤其是全民职工享受着相对完善的福利待遇。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均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享受一系列劳动保障待遇。

当时的福利待遇，有奖金，过年过节分东西，鸡蛋啦、月饼啦、水果啦，象征性的，那个时候看病、买药也都不花钱。我工作那个时候是享受分房政策的，一分钱也不花，但是当时咱也没想到那，也没申请分房。双职工家庭，或者跟老人挤在一起住不方便的，都可以享受分房。老人也可以分，年轻人要也可以有。我刚上班的时候还发手纸、手套、肥皂啥的劳保呢。另外，你比如说，职工身体不好的时候，还可以让你去免费疗养，死亡的还给丧葬费。（个案编号：C1）

除了对享受到的完善的福利待遇的深刻记忆，工人们经常用“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翁”等叙述来描述自己的身份。那时候的工人以“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稳、福利待遇好”而感到自豪，并且他们在名义上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这种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体现为工人在择偶及婚恋上的优势。以至于受访者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经常流露出一种作为工人的自豪感与优越感。

我们那个年代工人的地位相当高了。我到矿里那时候，效益非常好，在全市里也是首屈一指的。你搞对象要说是矿里头开车的，那就是很多人要嫁给你了，那时候工人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是个人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搞对象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个案编号：C2）

因此，煤矿的破产对于这部分工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在他们看来，煤矿破产了，他们被国家、被企业（单位）抛弃了，单位把他们一下子推给社会，对他们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了。因此，他们埋怨单位、埋怨政府的情绪比较多。

宣布完破产之后，大伙儿都蒙了！难以想象，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国企怎么能黄呢，想不明白，说破产就破产了，以后就是没人管你了，让你回家就回家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激动，骂领导，就是骂人。还有砸东西的，把储物柜还有出工戴的帽子都给砸了。（个案编号：C3）

## （二）对衰退时期“单位人”的不满

与对辉煌时期单位生活有着深刻留恋的下岗工人不同，另一部分下岗工人对单位体制内的工作表示不满与批判。这部分工人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厂工作。那一时期，恰逢L矿的衰退时期。由于煤炭生产成本不断提高，1989年L矿每吨煤成本231元，高出当时煤炭的市场售价每吨119元。1988年L矿全年生产煤炭80万吨，亏损1.4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7.27%，累计拖欠职工工资达2141万元、离退休职工养老金1877万元，欠发职工医药费、丧葬费3521万元，煤矿生产举步维艰。为了维持L矿的运转，抚顺矿务局每年都要给予6亿元以上的补贴。<sup>①</sup>

1994—1995年这段时间，矿里不能正常开支，因为当时煤炭形势不好，售价很低，1吨煤也就平均售价102块钱，低于成本，钢铁形势不好，煤卖不出去了，不能定时回款，有时候给你点钢材，然后你还得去卖，三角债严重。但当时我们矿还要多出煤炭，只有提高煤炭产量，才能保证开支。企业负担很重，有点焦头烂额，再加上1995年的时候要管一个中学、一个小学、全民职工10000人，退休职工9000多，矿属的大集体将近10000人，就号称30000人，这30000人总体看都在吃这点煤炭的收入。（个案编号：RSC5）

而1997年5月28日L矿又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69人死亡，1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45.61万元，使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L矿更加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并且由于L矿的煤炭开采年代久远，资源总量持续减少，可采煤量已由1953年的1.49亿吨减少至1999年时的1900万吨。<sup>②</sup>因此，在这一时期入矿的工人大多没有享受到优厚的福利待遇。

<sup>①</sup> 资料来源：《抚顺矿区志（1986—2006）》，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志书编纂委员会。

<sup>②</sup> 资料来源：《抚顺矿区志（1986—2006）》，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志书编纂委员会。

没上几年班就自己干发廊了。入职的时候厂子效益就不好了，啥活都干，干杂活。那时候工资每月100多块钱。1993—1994年左右去学美发了，那时候不让上班了，全让在家待着，先下岗，没人管你了，后来买断了。效益不好，就说放假了，都回家了。（个案编号：C4）

这部分工人在叙述单位体制时期内生活和工作经历时，“没觉得（单位体制内的工作）有多好”“赚的少”“没啥意思”是其主要评价态度。

在单位那时候挣的太少了，太穷了，我还得养俩孩子，根本就不够花，所以我就自己出去干个体了。对当时单位的工作说实话，我不留恋。但是当时我主动买断那时候，家里人尤其是我媳妇那边的人，他爸妈都说我疯了，铁饭碗给扔了，觉得我不切实际。（个案编号：C5）

尽管每个人的讲述存在些许差异，但他们的表述中都透露出对单位体制的不满，如觉得单位体制压抑个人的才能、局限性很大、缺少发展空间、领导安排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缺少个人成就感等。还有工人表示，单位领导受贿现象严重，感觉到了一种极度的不公平，甚至有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

我家里没背景，那真是比白纸还白，干干净净。改革开放以后，单位领导受贿的现象就越来越多了，我被分到了一线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啥好事都轮不到我。我就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好。后来我就主动离开单位了，我受不了气，忍不了。（个案编号：C6）

对单位有着不满的情绪，主动选择买断的工人，对煤矿破产、单位体制的解体有着冷静、理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煤矿的破产是大势所趋。在煤炭资源日益枯竭、煤炭生产亏损严重的情况下，企业的整改、转型甚至是破产都是情理之中的。工人们对于衰退期单位体制内不满的社会记忆以及对煤矿破产较为冷静和理性的看法，对其之后身份认同的重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想对于煤矿的破产还是要客观对待吧。这是形势所趋。L矿的亏损太严



重了，产出的煤越多，亏损的就越多，总让国家补亏空，时间长了国家也受不了啊。这么想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埋怨了，不能总是纠缠不休。（个案编号：C5）

#### 四、社会记忆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建构实践

身份认同作为一种认识、趋向、过程、态度，它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从对自身社会情境和环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和归因中引发的自身与环境之间复杂的动态平衡过程（莫利、罗宾斯，2001：61）。也就是说，“身份认同不能完全孤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它需要社会的一些基础性结构的支撑”（陈丽琴，2010）。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种支撑就是社会记忆（陶宇，2011）。那么下岗工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通过社会记忆得以重塑的？通过分析访谈资料文本发现，下岗工人在不同时期单位体制内的社会记忆基础上产生了以下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

##### （一）强化自尊：“工人老大哥”的身份认同

一部分L矿职工在下岗之后仍然持有“国家主人翁”和“工人老大哥”的身份认同。不过这种认同不是指对国家财产的所有权，也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对社会事务和自身命运“当家做主”的支配地位和参与权力，而主要是一种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作为一名工人的自豪感和骄傲感（李瑶，2008）。受访者提到，20世纪50年代，没有L矿的煤，就没有鞍钢的钢；没有鞍钢的钢，就没有祖国的强。他们对于自己在煤矿发展甚至是整个城市和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我感到作为L矿人挺骄傲的。你看L矿的这些都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但是他们做这个工作，就是个贡献。我觉得是平凡中的伟大。如果不在L矿待个几年几十年，是没有这种感觉的。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体验不到那时候采煤、运煤有多艰难、有多艰苦，这是用血汗换来的。这句话只有做过的人、体验过的人才能知道。只有他们才能知道L矿的工人有多么伟大！（个案编号：RSC29）

尽管客观上煤矿已经破产，单位业已解体，但是他们对自身的身份界定仍然是

“全民”或“集体”工人。原L矿的工人冯先生，在煤矿破产后拒绝领取安置费。因为在他看来，只要不领取安置费，就没有和L矿脱离关系。无论当前的境况如何窘迫，自己仍然是L矿的全民所有制工人，仍然是“工人老大哥”。

这是全民职工的证件啊，以前全民多吃香啊，这属于一个我年青时候的身份，我能舍得扔吗，反正不能给我抹下去吧，我的钱（买断钱）没拿，我也没签字，有L矿的名就有我的名。到哪儿查档案，我还是矿务局L矿的职工，他得有我的名。为这，我的手机铃声都设的是《国际歌》。你们听谁用这个铃声？我喜欢这个歌符合我的心情。（个案编号：RSC7）

这种“工人老大哥”身份还表现为一种自强自立的尊严、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在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氛围中，人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身体和语言重复呈现仪式行为的恰当模式，这种学习过程的结果就是“习惯性记忆”（陶宇，2011）。“在习惯性记忆中，过去是积淀在身体中的”（康纳顿，2000：72-104）。“工人老大哥”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性记忆”，成为嵌入他们身体里的重要部分，并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断被激活和提取，持续地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建构。因此，对于他们来讲，辉煌时期单位人的记忆不仅是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和留恋，更是一种身份认同重塑的力量。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持有“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个体大多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他们具有较强的自尊感。这种强烈的自尊感是导致他们保留此种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个体勤勉度较高。他们不仅在单位体制时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下岗后依旧凭借自身的努力挣扎向前；三是人力资本较低。他们大多数是初中学历，还有少数是小学学历甚至是文盲，在原单位从事的也只是简单的体力工作，如锅炉工、背煤工、钢筋工、皮带传送工等；四是社会资本较为匮乏。许多工人家庭的夫妇二人甚至老、中、青三代都在一个企业就业，导致大部分工人的社会资本同质性较高，企业的改制、破产和倒闭的影响波及全家，其他家庭成员、家里的亲朋好友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所以他们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五是经济资本较为匮乏。他们未能从上一辈或亲戚朋友那里得到经济资助，在日常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消费支出方面都难以为继，可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 （二）升华苦难：“社会底层”的身份认同

同样是留恋单位体制内生产和生活记忆的工人，但另一部分 L 矿的下岗工人却建构了一种“社会底层”的消极身份认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他们不同的个性特征所导致的。虽然这部分工人也具有社会资本匮乏、经济资本稀缺、劳动资本较低等特征，但其个性方面却明显不同。与持有“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工人相比，这部分工人首先勤勉度较低。他们个性懒惰，害怕吃苦，在择业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挑剔心理，如嫌弃工作时间长、工作太累、老板态度不好等；其次，对旧体制依赖性较强，“等、靠、要”思想严重，并且保守封闭、不思进取，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后，他们情绪低落，生活态度消极。这部分人走出企业、离开单位后，奋斗意识不强，并且心中充满着抱怨和不平的情绪，“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可以说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因此，对于这部分工人来说，辉煌时期的“单位人”记忆并没有转化为一种强化身份认同的自尊感。追忆过去，他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身社会地位及身份的种种变化，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苦难感，回首往事使得他们产生委屈感、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没有归属的失望感，因此变得破罐子破摔，怨天尤人。

别说国家了，就是抚顺市都没人管你，医保也没有，你就别说旁的了。就在这混着呢吗，早上 6 点来的，盯到现在，饭都没吃呢，大热天的，在这等着，没办法。我们现在都不如农民呢。看过苦菜花儿没有？我们就是比苦菜花儿还苦。（个案编号：C7）

在他们看来，如今自身的窘迫现状都是国家、企业和社会的责任，他们为国家 and 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最后却被国家和城市所抛弃，成为无人问津、被人嫌弃的底层，他们的心理充满了强烈的愤懑与不平。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对他们做出的“没能力”“低素质”等评价，他们已经被动接受与认可。

那不就是这样吗？啥能耐没有，谁能瞧得起你。我们想干点啥，但是没那能耐啊，要啥没啥，可不就是底层嘛。（个案编号：C7）

值得注意的是，身份认同的转变与重塑也是一种文化适应，即下岗工人在原单

位形成的“单位记忆”与单位之外的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大多是计划经济年代在资源型国有企业开发建设矿区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本质上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体现着人对自然原本没有的东西的创造，本身具有超越性的特点，即表现为文化主体的创造性，也是文化自觉的表现。同时，受资源型国有企业的影响，城市文化中计划经济意识较强，市场经济意识观念较为淡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这种文化特性在其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并成为被其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共同行为模式，对个体的行为具有现实的规定性或强制性。这是文化的自在性的表现，也是文化发展的惯性（聂亚珍、杨成刚，2014：83）。持有社会底层身份认同的工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明显地体现出资源枯竭型城市文化的这种保守性、依赖性，他们既没有保留单位体制内全民职工身份的自尊感，同时又未能很好地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市场经济文化，依然指望着国家或单位把他们“包下来”。他们已经认同了自身的底层地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技术没技术、要能力没能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当前的底层状况归结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无论是“工人老大哥”，还是“社会底层”的身份认同都显示出社会转型时期下岗失业工人社会心态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资源枯竭型城市无论是外部制度环境，还是微观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工人群众退出单位进入市场，福利市场化、社会保障多方共担、住房市场化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使得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内的全方位社会福利和保障一去不复返。他们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地位的滑落、工人身份的优势不再，进而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宏观层面对于工人的定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工人阶级领导”，但这样一种定位在微观层面上已经不再奏效，因为下岗失业工人对自身所处的实际身份有着真切的体认。这种宏观意识形态定位与下岗失业工人真实社会身份的矛盾，使得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产生了强烈的困惑，从而体现为持有“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下岗工人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的“全民（集体）职工”身份的追忆、维护和延续，以及持有社会底层身份认同的下岗工人对当前自身的底层社会地位及身份想“抛而远之”却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态。

### （三）理性重构：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

持有对单位不满记忆的下岗工人，则既没有沉浸在“全民职工”的优越感和自

豪感中，也没有妄自菲薄、怨天尤人，而是能够较快地接受自身身份的转变，客观、理性地面对现实。对于他们来说，单位原本就不值得留恋，单位改制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机会，他们对自身有着积极的体认和定位，对未来的生活持有乐观向上的态度，他们拥抱市场经济，并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再就业路径。

我觉得离开单位也挺好的，不出来就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有多大，生活有多精彩。在单位那时候效益也不好，没感觉到有啥好的。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买断以后，来到社会上虽然累点，就是赚辛苦钱呗，个人有多大能力赚多大钱。就是觉着自己想干啥干啥，一方面是自由，另一个咱说的也是能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发挥了。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呗。咋说呢，反正觉得自己做点小买卖挺好的，挺满意现在的生活。（个案编号：C8）

下岗工人的身份认同是在流动的社会时空结构以及社会记忆中不断被建构的。他们在不同的社会时空中所经历的生命历程及社会行动，会给他们留下不同的社会记忆（王春光，2001）。而社会记忆有可能重建社会时空，他们凭借这样的记忆来确定自己的行为，构建对自身以及对周围的认识（王春光，2001）。社会记忆对身份认同的建构是情景性的，是流动的，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刘朝晖，2003）。对于持有对单位不满与批判社会记忆的下岗工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以当前的经历来建构自身的身份认同，在市场经济中勇敢尝试、施展能力、获得成就，因而更加深刻地体认到了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我是这么想的，都实行市场经济了，机会越来越多，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饿不死人，先不说能否挣大钱，但是我有信心肯定比在单位挣得多。这玩意儿就是这样，你地位的高低跟你在不在厂子里头工作没啥大关系，你挣到钱了，你就有地位了，至于工人不工人的，我真没觉得就比其他人高多少，也没觉得我出来干个体就比工人低一等了。无论干啥，看的都是个人能力。（个案编号：C5）

对于这部分工人来说，体制内的工人身份既没有让他们感到自豪，又没能给

他们带来太多的物质利益，所以他们对体制内的工人身份没有任何留恋，部分工人甚至是在煤矿破产前主动选择买断，离开单位。也就是说，下岗对他们来说不是被动的、突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选择性和计划性，这也使得他们对离开单位后的生活也有着较为清晰的目标和计划。

当时是主动选择买断的，那时候矿上效益不好，就有提出这个政策了。但是也没明确说叫买断，就是一次性给你一笔钱，就跟单位脱离关系了。我和我老公商量，我们就选择拿钱离开煤矿了。当时想的是，家里有亲戚做琥珀生意的，做得挺好的。我们俩就想着去他那儿帮帮忙，还能学到一门新手艺。摸清门道儿之后，可以干一个自己的买卖。（个案编号：C8）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下岗的经历对他们之后的人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以沉着冷静的态度面对下岗，对下岗之后的生活有较为清晰的规划，并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他们已经培养出了新的社会适应性，即对市场经济下多劳多得、能者上弱者下等优胜劣汰文化的适应与认同。他们更加追求实际的经济效益，“合理而最大化地赚钱”的市场经济下的理性精神在这部分工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还是喜欢现在的生活，不像在单位那时候，干多干少一个样儿，现在干自己的买卖自己说了算，一个是自由，另一个是你付出的多你赚的就多，生活也就更有动力了。就像我们这个小店，你现在是给自己经营，所以就一天都舍不得耽误。我从开店到现在，除了送我姑娘去外地上大学耽误了一个星期，从没因为啥事不开门过。耽误一天就少赚不少钱，所以也根本不知道啥是放假，自己的买卖舍不得耽误。虽然累点，但是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对现在的状态挺满意的。（个案编号：C8）

## 五、身份认同重构的结果：不同生存策略的选择

重塑后的不同身份认同会对其生存策略的选择产生何种影响？下岗失业人员的身份认同制约着他们再就业的转型适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在单位之

外的社会中社会交往的意愿、范围及择业的去向，进而导致了不同的再就业路径选择。

### （一）自力糊口型生存策略

自力糊口型生存策略指的是由于个人原因或其他条件限制无法获得长期稳定的较满意工作而不得不临时从事某一活动，持有“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下岗工人大多采取这一生存策略，主要是以非正规临时就业为主。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实现了再就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一些技术含量较低、零散的、非正规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较差的职业。其中，女性大多数从事的是摆摊儿、酒店服务、家政服务等工作，而男性大部分是靠出卖力气，如搬家工、装卸车工、司机等。

下岗后，俺两口子卖点儿小菜，就是这么维持下来的。卖菜的过程酸甜苦辣肯定都有了。刚开始我就拿个滑轮车，找人要的轴承，自己钉的那种。搁马路上拽，哗啦哗啦响。那费劲呐，冬天冻得呀，有啥办法。你得生存啊。就是维持个生活。这两年不好干，做买卖的太多了。这几年下岗职工也多，跟媳妇儿因为做买卖不挣钱，上货有时候卖不动，坏了、烂了，骂媳妇儿，有时候媳妇儿也说，你怎么不整明白，互相埋怨。卖点儿菜不容易。（个案编号：RSC7）

办了停薪留职之后，就是到处打工。就是出苦力。现在就是每天蹲在马路牙子这（苦大力），这不，现在就等着挣钱，买米下锅呢。赚钱了就能吃饭，赚不来钱就不吃饭了，今天到现在一毛钱没挣呢，中午饭都没吃。这些人（蹲马路牙子上的其他工友，有八九个人）不都这样嘛，都在这干靠呢，大热天儿，现在都34度，现在就等着来一位先生顾我们干活、出力。搬个家啦，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个案编号：C9）

可以看出，他们就业具有很大的间歇性和流动性，经济收入不稳定，并且工资水平较低，通常维持在1200元—2500元不等。冯同庆（2002：65）指出，工人对自我尊严的守护会导致三种情形的出现：一是自尊演化为自惭，而自惭导致地位进一步降低；二是自尊体现为自重、自救，使得地位得以维持；三是自尊升华为自强，使得地位重新改善。采取自力糊口型生存策略的下岗工人在“工人老大哥”的身份

认同基础上产生的自尊，虽然也体现为自重与自救，试图使自身状况得以改善，但其结果并不理想。例如，有访谈对象表示，“煤矿黄了，人心不能黄，良心不能黄，自己不管怎么说也是大老爷们儿，还想靠自己的奋斗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这也是自己的尊严”（个案编号：RSC22）。换言之，该类型的下岗工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并未获得一份较为理想的职业，进而实现生活境遇的改善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乏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高、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低等宏观性因素。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煤炭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受到传统所有制和产业结构模式的双重制约。长期以来，抚顺市的经济增长过多依赖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导致吸纳劳动力多的轻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使得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机会较少。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把对职工劳动技能和素质的要求提到了首要位置，而采取自力糊口型生存策略的下岗工人劳动力素质较低，使得他们的再就业难上加难。三是采取自力糊口型生存策略的工人，其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较为匮乏，而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个体职业获得和社会地位的改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上述三种因素的掣肘下，一部分下岗工人只能采取自力糊口型生存策略，未能成功实现自身生活状况的改善。

## （二）外部依赖型生存策略

外部依赖型生存策略体现为对国家、政府和企业的严重依赖，其典型特征是被动的、等待和观望，它是持有社会底层身份认同的工人所采取的一种主要行动策略。对于采取外部依赖型生存策略的下岗工人来说，辉煌时期的惯性和虚荣心使得他们在短时期内难以接受城市或企业衰落的现实，他们不是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企业的改制、破产和倒闭，而是一直沉浸在一种埋怨国家、埋怨社会的愤懑情绪之中。他们不是选择告别过去、面对现实、积极寻找出路，而是仍然寄希望于国家和企业，处于一种消极等待的状态。外部依赖型生存策略的工人不同于糊口型生存策略的工人，虽然后者也难以接受企业衰落和破产的现实，但他们将对“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延续转化为了一种强烈的自尊与自救，而采取外部依赖型生存策略的工人则是在下岗失业之后一蹶不振，他们不是寄希望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目前的窘迫现状，而是仍然希望国家将一切全部包下来。在受访者韩先生（个案编号C10）看来，当前需要凭借自身努力去找工作的现状是社会的一种倒退，他极度怀念“一切包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



就像我们年青那时候，我们也不用考虑工作，都跟着父母，所以说我为啥对毛主席感情特深呢，我对毛主席特有感情。那时候你该上学就上学，毕业了之后，说白了，不管是全民还是大集体，你肯定都能有个工作。（个案编号：C10）

郭女士（个案编号 C11）的消极身份认同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等、靠、要”，向国家“伸手讨饭吃”的思想。在她看来，自己要能力没能力、要技术没技术，体力活儿又太累，所以啥也干不了了，只能依靠低保维持生活了。

下岗之后就在家待着，啥也没干。后来就结婚了，就嫁到农村了，在那养个猪、鸡什么的，也不挣钱啊，就嫁给（到）农村了。后来房子动迁了，就搬到这来了。社区给办了低保，因为说我有劳动能力，所以只给我孩子一个人办了低保。想出去找活干的，也打过一个月两个月的那种工，但是那种干不了，太累，给个人打工，给你的钱不多，那点（工作时间）可长了，那心理压力很大。想当初咱也是穿一身工作服的人呢，现在你去给别人打工，尤其是个人家那种，老板给你的钱不多，活儿还贼多，点儿（工作时间）可长了，咱干不了，后期就干不了。要是没有低保，我就活不了了。（个案编号：C11）

可以说，此种类型的工人已经放弃了挣扎与奋斗，转而依赖低保政策，过度依赖政府，并且也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情理之中的。此种身份认同下的工人在再就业过程中积极性、主动性较低，他们往往赋闲在家，拒绝求职或创业，所以当前大都是没有工作的无业游民。

### （三）进取发展型生存策略

进取发展型的生存策略指的是个体从事某种活动是为追求个人理想价值的实现或是发现市场中存在的商业良机。这类人一般都拥有非常强烈的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其行动是建立在个体的自愿、自觉、自主的基础上，并且在行为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主动性和坚持性。抱有“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身份认同的工人大多采取发展型的生存策略，他们对单位制有着清醒客观的认识，并且能够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对新事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较高，并且思维灵活、勤奋上进，从事个体经营、进入私营企业、重回体制是其下岗后的主要就业方

式。还有少数部分工人抓住发展机遇，变成了成功企业家。受访者杨先生（个案编号 C12）目前是抚顺某煤矿的技术经理，1999 年 L 矿破产后，为了安置下岗职工，抚顺市政府、抚顺市矿务局、抚顺市 D 区政府在 L 矿北矿区成立了 T 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杨先生也参与其中，入了股份，并一路从通风队长成长为 T 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年薪高达百万元。对于自己下岗后的成功奋斗经历，杨先生表示，这是因为始终有一种信念在支撑着他。

人得有一个信念和追求，下岗之后，我来到 T 煤矿，又是从头开始，从技术员做起，但是我并没有抱怨过，人就得调整自己的心态，一步一步来。我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尽可能地去多做多学。有的时候我下井跟着老师傅去处理特殊状况，都是我扛着起动机，然后老师傅背着手在后面跟着，我是非常虚心地跟着老师傅学，学完了之后我可以对每一条生产线、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所了解和掌握，这样对今后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我有一个目标，我要掌握每个生产环节，不然以后有一天真的需要我去管理，我不能一出现问题就听下面的师傅怎么说，万一他要蒙我呢，对不？我不能被下面的人给蒙了，不能让他们糊弄住。出现问题了，我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干，去几个人。从我年青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有这种信念。（个案编号：C12）

同时，理性的身份认同重构还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交往作用于其生存策略的选择。对身份认同进行理性重构的工人，在社会交往方面表现得也更为积极、主动，他们乐于结交朋友，为自己积累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性，无论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还是边燕杰对于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关系的研究以及据此提出的“强关系假设”（Bian, 1997），都强调“关系”即社会资本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重要作用。刘先生就是通过运用“关系”资本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典型案例。下岗后，刘先生（个案编号 RSC24）先做起了小买卖，后来经好朋友的介绍，去了抚顺市的某私营煤矿企业上班。

这时候，Z 煤矿缺少办公室人员，通过朋友介绍我去了。主要为领导服务，做一些后勤工作，每月有 2000 多元的收入。在国有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在这里混日子不好使。民营企业定岗定员，按劳分配，管理相对严一些。

在这里上班还能碰到以前矿里的老人。他们最大的心愿是早日退休，也该享受一下了。我是特殊工种，还有几年退休，希望Z煤矿越来越好，我也不打算到别处干了。（个案编号：RSC24）

我们可以看到，“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借助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机制，在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下岗工人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是建立在一种积极理性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认同方式也影响着他与周围人的交往态度和方式，就如上文中刘先生所表述的，他在生活中非常爱结交朋友，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有，就算出去吃个饭的间隙，也有可能交上一两个朋友。

此外，与持有“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工人相比，对身份认同进行理性重构的下岗工人，其生存状况的改善较为明显，这也得益于他们所拥有的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简单来讲，经济资本可以理解为财富的具象形式，如收入、财产、储蓄等。持有积极建构型身份认同的下岗工人在突围与救赎过程中所有拥有的经济资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其经济资本表现出明显的传递和转移性质。

这不是咱家老头儿（指他的父亲）吗，他跟老太太（指她母亲）当时给我出的钱，他俩之前都是矿上的工人，俩人一辈子省吃俭用的，攒了点钱，都贴补给我了。还有当时买断给我的七千多块钱。也不能吃老本，就想着干点啥，后来就开了这个小店。（个案编号：C4）

下岗工人的经济资本大部分来源于上一辈的财富转移，部分工人即使未能得到上一代传递下来的经济资本，也通过其他形式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

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来的。不然一下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啊。当时借钱也不能白借给你，即使是自己家亲戚，要觉得你没实力能力还钱也不会把钱借给你。我父亲有退休工资，他们也都知道，就相当于拿这个作担保了，每个月开资的时候人家就把钱还给人家一部分，到时候给你留个最基本的生活费，剩下的人家就都拿走了。这样已经够不错了，咱说的，肯借给你就够意思了。（个案编号：C5）

也就是说,持有“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身份认同的下岗工人或者是拥有上一代转移和传递下来的经济资本,或者是通过其他形式如借钱等策略筹集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得以从事诸如打印店、澡堂、理发店、出租车司机等个体经营,进而实现了下岗后的突围与救赎,使自身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这也说明了,在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经济资本也是下岗工人摆脱底层化的命运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资源枯竭型城市抚顺煤矿下岗工人的访谈资料文本分析发现,下岗工人基于“对辉煌时期单位人的留恋”与“对衰退时期单位人的不满”两种不同社会记忆形成了“工人老大哥”“社会底层”“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在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下又形成了“自力糊口型”“外部依赖型”和“进取发展型”三种不同的生存策略。

首先,身份认同的建构以社会记忆为基础。过去的记忆对个体当下的身份认同有着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个体当前的身份认同是立足过去对现在的一种重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如何叙述和记忆过去,个体凭借这样或那样的叙述和记忆(或经验)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个体的社会记忆是什么,如何记忆,不仅反映着他的社会关系、人生态度及生活期望,并且主导着他的认知和判断,甚至预示未来的发展轨迹。社会记忆作为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体,聚焦个体生活的过去,并影射着个体生活的现状与未来,它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发挥重要作用。资源枯竭型城市抚顺的下岗工人在“对辉煌时期单位人的留恋”和“对衰退期单位人的不满”两种社会记忆基础上建构了三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即“工人老大哥”的身份认同、“社会底层”的身份认同和“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的身份认同。

其次,身份认同是认知建构与行动建构的互动互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建构,它不仅是有个体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佟新,2002),还是一种行动建构。身份认同所强调的是个体对于自身状态的接受与承认意涵,不仅指个体对自身的地位具有明确的意识,还包括对这一状态的认可、接受以及为构建自己理想的身份认同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份认同是行动者获取行动意义的源泉,在某个社会结构

下个体如何行动，往往经历了认同的中间作用所影响（卢晖临、潘毅，2014），人们只有明确了“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才能做出进一步的行为选择。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主体对自我的认同受到结构性力量的形塑，身份认同一方面来源并作用于感知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是行动得以发生的中介，并且二者会相互作用、相互生成。因此，身份认同是认知建构和行动建构互动互构的过程和结果。

最后，个体的身份认同制约其生存策略的选择。身份认同建立、维系、转变、强化、削弱等建构过程还影响着个体的行动策略，是决定个体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资源枯竭型城市抚顺下岗工人在三种不同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行动策略。持有“工人老大哥”身份认同的工人大多采取一种自力糊口型的生存策略，“谋生存”是其主要的行为动机，一些质量较低的非正规零散就业是其主要的谋生手段；持有“社会底层”身份认同的工人，大多采取的是一种外部依赖型的生存策略，当前他们大多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依赖低保等社会救助是其主要的谋生手段；持有“拥抱市场经济的奋斗者”身份认同的工人，大多采取一种进取发展型的行动策略，其行动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个体经营、重回体制、进入私企等是其主要的就业渠道。这部分工人下岗后大都实现了生活状况的改善，甚至有个别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跃升到企业家阶层。

应当承认，本文对抚顺 L 矿工人在该矿破产后的社会记忆、身份认同的类别化分析还是初步且相对简单化的。在现实生活中，L 矿工人的社会记忆和身份认同更加复杂，我们从中挖掘出来的，只是一些主导性的社会记忆和身份认同类型。同样，关于他们的生存策略的类型建构，也许只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L 矿工人在煤矿破产后就开始采用不同的生存策略，期间应该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尝试，并且随着尝试结果的不同而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存策略选择。我们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影响他们的种种尝试的不同结果的因素和机理是什么？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转型对人们的生活世界变化的深层次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艾娟，2010，《知青集体记忆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艾娟、汪新建，2011，《社会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新疆社会科学》第2期。

陈丽琴，2010，《制度分析框架下的女县长发展研究——基于湖北省35个干部的访谈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

冯同庆, 2002, 《中国工人的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康纳顿, 保罗, 2000, 《社会如何记忆》,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峰, 2010, 《网络、认同与行动: 基督徒的社会行动逻辑》, 《社会科学家》第6期。

李瑶, 2008, 《找回“面子”: 下岗失业工人的自尊维持》,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刘朝晖, 2003,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 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2期。

卢晖临、潘毅, 2014,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社会》第4期。

莫利、罗宾斯, 2001, 《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 司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聂亚珍、杨成刚, 2014, 《资源枯竭型城市永续发展战略》,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孙德忠, 2006, 《社会记忆论》, 湖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陶宇, 2011, 《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记忆与身份建构——基于H厂的口述历史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佟新, 2002, 《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失业危机”对工人的意义》, 《社会学研究》第6期。

万恩德, 2018, 《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机制——以档案为分析对象》, 《档案管理》第2期。

王春光, 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第3期。

王汉生、刘亚秋, 2006,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社会记忆的研究》, 《社会》第3期。

王莹, 2008, 《身份认同与身份建构研究评析》,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谢茂拾, 2005, 《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创新: 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退出与就业制度变革研究》,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宣朝庆、司文晶, 2015, 《工厂女工的身份认同与策略实践——基于1919—1936年津沪两地的分析》, 《山东社会科学》第4期。

叶子, 2014, 《社会学视野下的记忆研究》, 《前沿》第Z6期。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 2012, 《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心理研究》第5期。

张岳、良警宇, 2011, 《“选择性建构”: 国家、市场和主体行动互动下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对北京某满族村的个案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

周嘉倪, 2017, 《单位制背景下失业工人身份认同重构研究——以山东省东营市胜利油田为例》,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朱兴涛, 2014, 《论乡村社会记忆的苏醒及其对农民选择的影响: 基于一个中国农村合作社发展的考察》, *East Asian Sociology of the 21<sup>st</sup> Century* 6.

Bian, Yanjie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Connection, Bridges and Job Search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62 (3).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抚顺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刘诗谣)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光金)

责任编辑: 吴莹